

# 小园香径的周边风景

赵惠俊

诗词之间的分明界垒在日本学者那里并不存在，他们自如地将词同样视为士大夫的一种文学表达，充分运用士大夫文学及日常性视角观照词体写作。



2019年12月，中原健二《词及其周边：宋代士大夫与其文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十一篇论文合编而成，这些论文的写作时间跨度很大，有首发于1975年的《柳永的词——关于其艳词的考察》，有发表于1988年、1994年的名篇《诗语“春归”考》《丈夫与妻子之间——以宋代文人为例》，还有2013年新近撰写的《关于寿词——生日与除夕》，完整呈现了中原健二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他的研究方法、词人词作偏好、思维观念的发展变化等诸多细节皆可从中窥见。

今日之学术，已日益国际化，但日本词学的声音始终相对微弱。耕耘唐宋词四十余年的中原健二，便在中国大陆寂寂无名，直到此书的出版，终获一次展示机会。实际上，中原健二受到的冷遇不仅是日本词学研究者的常态，也是海外词学研究者共同的遭际，其背后承载的是中国词学独立自主的强大研究传统。这是《词及其周边》在展示中原健二代表的日本词学研究之外，更可以牵扯出的一段故事。

## 中国词学传统与海外唐宋词研究的译介

今日之宋词研究，与诗学相比可谓个性十足。由于音乐文学的性质，倚声填词本是一项非常专业的技能，这使得传统词学也具有强烈的专业色彩，为研究者设置了较高的进入门槛。这些源于词体本身的专业性问题并不能被现代学术范式与西方文艺理论妥善解答，于是宋词研究需要与传统学术保持强烈的粘连。奠定现代宋词研究基本范式的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三大家，或直接师承，或瓣香私淑，都与朱祖谋、王鹏运等晚清浙常词派后劲有着紧密的师友渊源。三家之门又培养了新一代的重要宋词研究者，直到今日，绝大多数词学研究者的师承还都能够溯源至斯，始终将传统词学薪火相承。在此学术传统与格局下，中国的宋词研究起点很高，成就巨大，更获得了国际话语权。

尽管有如此巨大的优势，与传统的高度粘连却在另一层面产生了相对封闭的问题。实际上除了三大家，民国时期还有一批主要在现代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重要宋词学者，例如詹安泰、宛敏灏、邱世友等名家，他们与传统词学若即若离，尽管皆成就卓越，但因为词学强烈的专业性，还是逊色三大家一筹，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影响也非常有限。本土尚且如此，遑论海外宋词研究。海外学者的研究水准又有明显差距，自然不会获得太高的译介热情。就北美学者来说，最初引进的论著如林顺夫《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等，都是成书于二十余年前的旧作。近年情况虽有变化，如田安《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等都是前沿研究成果，但这些学者并非专力治词，方法与传统词学差异较大，势必会出现矛盾冲突与专业性的不足，以至于影响并不可观。

相比之下，日本词学论著的译介就更显不足。20世纪90年代前后引进的村上哲见《唐五代北宋词研究》、青山宏《唐宋词研究》、宇野直人《柳永论稿》以及王水照、保荇佳昭编选的《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主要也是一二十年前旧作。进入本世纪之后，日本中国学论著的译介蔚然成风，深刻影响了本土文史研究的发展。然而宋词研究却没有得此风潮之助，仅零星引入了保荇佳昭《新兴与传统：苏轼词论述》、村上哲见《宋词研究》等。尽管村上哲见个人成就极高，但只能是一处水草特为丰润的绿洲。中国学者更热衷于寻觅村上哲见与民国词学三大家的交往联系，尤其最为乐道龙榆生与村上哲见围绕李煜词研究的书信往来、诗歌酬赠。相较之下，中原健二倒是很纯粹，完全在日本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下成长。求学于京都大学的他从未来过中国，主要师从禅宗文献与敦煌学大师入矢义高与中国文学研究大家小川环树，词学启蒙则自我追认为

村上哲见。于是乎这本承载其学术生涯的论文集，倒成为了可以全面观察日本宋词研究的窗口。

近年来，词学传统相对封闭的负面影响日显严重，宋词研究似乎陷入了停滞。学者的对策主要是将关注点下移至明清甚至近代词学，这让宋词研究的困局于搁置中更加恶化。无论如何，作为一代之文学，宋词的传承与研究终需不断持续，那么在坚持研究传统与专业特质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开放视野，借鉴不同的方法观念为我所用，应是当下的迫切之举。不如就以这本最新译著为契机，看一看日本宋词研究具备的可取之长。

## 来自周边的拓展：士大夫文学与日常性

正如中原健二在后记中所说：“虽然本书意在‘宋词研究’，但其中称得上纯粹的词人论或作品论的只有第四章一篇而已。其他内容，例如对‘宋人是如何感受宋词魅力的’‘在宋代文学中词所占据的位置是怎样的’，甚至于‘能否通过词或诗来窥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情感、生活信条’等问题的探讨，只能说是出于对我个人所关心的问题而进行的考察。因此，与其称本书是以‘词’为中心，也许不如说是对‘词的周边’进行的考察更为确切。”（第200页）本书的研究将词置于宏大领域间作通观式的考察，即副标题所揭示的“宋代士大夫与其文学”。士大夫文学是日本宋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研究观念与阐释模式，核心要素来自“唐宋变革论”，主要通过作者士人身份性质及其变化的考察，追索其在政治、社会、日常生活间的种种动态及现象，以此还原士人心态并探究文学表达。这个研究观念为日本宋代文学研究贡献甚巨，影响最为深远的成果莫过于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日常性之说。不过吉川幸次郎并非词学专家，其说在宋词领域未能泛起波澜。

诗词之间的分明界垒在日本学者那里并不存在，他们自如地将词同样视为士大夫的一种

文学表达，充分运用士大夫文学及日常性视角观照词体写作。村上哲见便由此提出南宋词的意义单元切分应由身份不同而划为士大夫词人与专业词人两类。尽管这还是一种二元讨论模式，但却比传统的豪婉二分多了大量空间。盖婉约豪放是由文本内在质素所作的类属，从而归类之后，便会将其他范畴的文本特征拒之其外，也就难以概复杂的文学现象及变化。而士大夫词人与专业词人则是文本外部的区分标准，与文本内部的诸多要素并不冲突，从而也就能予以相对完整的受容。与之相类，中原健二擅于在日常性视野下深入挖掘文本承载的日常情感及其幽微变化。《关于寿词——生日与除夕》一章便借由寿诗与寿词的比较，探讨宋人对待生日与岁暮的心态变化。他敏锐地发现南宋自寿词中频繁出现提及年岁或增寿的句子，这与古人以除夕为增岁之期的习惯不太相符，于是将考察的范围延伸至除夕诗中的年龄吟咏，最终发现宋代士大夫将生日与计算年龄的起点无意识地重合了起来，从而判断南宋出现了将生日作为人生里程碑的心态。中原健二还特为强调：“寿词在词史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题目，但绝不应该只将它限定在词中来考虑。”（第105页）这对如何有效处理数量众多却乏善可陈的南宋寿词极具启示性，并能拓展至特征类似的节序词、应制词、颂圣词的研究上。

相关案例在日本学界早已屡见不鲜，比如宇野直人就将柳永的《二郎神》（炎光谢）与历代七夕诗相比较，从二者的异同变化中探索柳词的创作环境和文化背景，最终落脚于柳词的文学特征及文学史意义上。可见日本学者相当广博地利用词之周边材料，不仅有周边环境，还包括周边文体。实际上20世纪的日本宋词研究往往与唐诗相融一体，治宋词者通常也精于唐诗研究，罕见独治词学的专家。如青山宏就同时以唐诗与宋词的研究著称，村上哲见也本非专力攻词，而是希望能综合研究唐诗宋词，并曾提出“唐宋韵文文学研究”的课题。于是日本学者非常习惯

于诗词间的跳跃，中原健二就时常完全沉浸在唐诗的世界里。比如《诗语“春归”考》一章，为了弄清宋词中的“春归”主要指的是春天归去而非春天归来的意义，他对唐诗中的春归含义以及春天结束的表达做了详尽考察，揭示出诗词间存在不同语义选择，从而发现作家在填词时更在意吟咏方式的花样翻新，推动了对词之文体特性认识的深入。在中原健二看来，唐诗与宋词的研究方式完全可以互通延伸。他的《李义山的〈乐游原〉与宋人》一章便径将对《乐游原》“夕阳”“只是”二词的考察迁移至宋词，从而完成了一番诗歌接受的研究。

文体界限的打破与切换当然不仅限于唐诗宋词之间，宇野直人便同时利用赋、曲甚至话本小说。至于宋代内部的切换当然更为寻常，中原健二便跳出文本之外，考索宋代文人生活中的妻子身影，这种对特定生活场景的细腻再现，当然还是日常性思路的完美运用。再如任教于早稻田大学的著名宋诗研究、苏轼研究专家内山精也，便也积极关注与思考宋词相关命题，曾发表过《苏轼次韵词考》《苏轼隳括词考》《两宋隳括词考》等词学论文，呈现着来自宋诗研究的灵感之源。

## 语词与修辞：文本内部构造的深细揭示

2009年，日本汲古书院将中原健二的论文集出版，本书所收的十一篇论文中的七篇就互见于斯。日文论文集题为“宋词与语言”，其日文原文“宋词と言葉”也被印在《词及其周边》的封面上，标识出另一重周边之助——语言学。揭示文学内部构造机理以及情感传递的生成机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从而面对深邃精细的宋词文本，以及来自音乐的声律要求，也就不能不更为倚赖语言学的知识与方法。这提示着宋词研究的持续发展，除了尽可能地向外开放外，回归文本内部的深细钻研，是另一条重要门径。

对于思维本就细腻精巧的日本学者来说，于文本内部见微知著，算得上本色当行，从而能够看到大量以小见大式研究，即通过全面追踪某一语词、意象的手段，探索文学相关的意义。《词及其周边》中对于“春归”“夕阳”“只是”等语词的考释及阐发，便是如此。更典型的案例当属保荇佳昭对于东坡词“梦”“雨”“狂”“多情”等语词的追踪讨论。